

# 國父上書李鴻章考實

晁介嶺

## 一、前言

約在二十年以前，聽黨國先進某公講 國父上書李鴻章經過情形，他說：「國父係由唐紹儀介紹晉見李鴻章於天津外交衙門。當李氏出而接見 國父時，聽到 國父用廣東話說出自己的姓名，將『文』字聽爲『問』音，認爲不雅；經唐紹儀說明係文章之『文』非問答之『問』，李始釋然。並對 國父曰：『不懂官話，不能做官』等語。會談未久，李命端茶（送客）， 國父頗爲不悅，於走出外交衙門，即大罵滿清腐敗，鴻章官僚，非將他們推倒不可。」當時聽了這番演講，雖然感覺精彩有趣，但却信而不疑，一則某公係同盟會之老會員，他又擔任黨政要職，豈能信口開河，當然不我欺也；再則由於自己學問有限，涉獵不廣，故而信以爲真。嗣執教本校，專任三民主義及 國父思想等課，爲了充實教學，自應廣蒐教材，詳爲研究，以求教學相長，因而發現前所聞者，出入甚大；而於去（59）年十二月間，臺灣電視公司以電視小說方式，播映「開國前後」歷史劇，看到 國父會李鴻章一幕荒唐不實，錯誤百出之演出後，尤感詫異！以臺視編劇陣容之堅強，而且擁有許多素負盛名之小說作家，何竟如此大膽，居然歪曲史實，任意編造，而於觀衆紛紛提貢不同之意見後，臺視編劇方面不但沒有接受觀衆指出錯誤的雅意，而且引了許多書籍及有關資料，強爲辯護，似乎振振有詞。誠如本（60）年元月一日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多陽所寫「關於 國父與李鴻章讀後」一文所言：「臺視編劇由史料而史實，一錯再錯，抑且誣攀先賢（指臺視編劇引吳文之誤）。此事如不向觀衆讀者辨明，則 國父事跡，將無信史；稚老冤情，同沉海底。今後亦將無人願向電視臺提貢意見。」一針見血，的是好評。

國父上書李鴻章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、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）的事，距今不過七十餘年，當非遠史可比。編劇人何竟如此膽大妄爲？考其原因，並非由於他們所指的資料不正確，而是由於編劇人既未能認真閱覽，又不去詳細研讀，只顧「大膽假設」，沒有「小心求證」，以致一錯再錯！似此以非爲是，固執偏見，難怪受到觀衆指責。況上書一事，爲國民革命之重要關鍵，關係開國歷史至爲重大，豈可杜撰意測，擅改史實呢？余對此事，實難緘默，正擬根據史料，着手寫作，適奉孫校長亢曾先生爲編印「師大學報」，來函徵文，爰以「國父上書李鴻章考實」爲題，以抒一得之愚。

本文除前言外，分爲 國父上書與國民革命、上書前後國內局勢、上書動機與目的、上書經過情形及結論各節。本擬抄附上書原文以供讀者參考，因限於篇幅，未便列入。本文參考資料，恐難周全，遺珠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匡補闕遺，尤所企盼，尙希高

(126)

明教正。

## 二、國父上書與國民革命

國父幼年，喜聞太平天國故事，嘗以洪秀全第二自稱。考試院長孫科博士，在其「八十述略」書中有云：「從史書上看，我的祖先都是深明大義，很重氣節的。宋亡，則不仕於元；明亡，則不仕於清。到了抗清兵敗，就乾脆隱居起來，過着耕讀傳家的生活。這屢世相傳的民族大義，對國父的影響是很大的。他後來之所以領導國民革命，推翻滿清帝制，一方面固然是受當時的環境所刺激；另一方面，也未嘗不是祖先遺傳的結果。」

國父七歲啓蒙，十歲入鄉塾，十三歲畢經業，故其思想之淵源，以因襲中國固有者爲首先。十四歲隨母赴檀香山，道經澳門，「始見輪舟之奇，滄海之濶，自是有慕西學之心，窮天地之想。」抵檀後，初在其兄孫眉公商店習商業，旋入英國教會主辦之意奧蘭尼書院 (TOLANI COLLEGE) 就讀，此一八七九年事也。

國父在意奧蘭尼書院讀了三年，於一八八二年畢業，曾獲英文優良第二名獎。畢業後曾爲其兄經營商務約半載，乃考入美國教會學校阿湖書院 (OAHU COLLEGE) 肄業。國父本擬畢業之後，再赴美國深造，不料因信教問題，輟學回國。國父於抵達國門返回故鄉途中，適遇海關稅吏騷擾乘客，索賄船主，因而憤怒的對乘客說：「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，我們能坐視嗎？」並向船上的人演講中國政治極應改革的必要。返家之後，見鄉民之保守如故，皂吏之苛橫依然，心中無限感慨，故經常宣傳改革，並指出滿清稱帝，不配作中國之元首。惜鄉民無知，未予重視。國父家人固然希望他安守家園，過其平靜生活，國父因受了西方教育的影響，對於家鄉種種愚昧無知和迷信鬼神的陋習，不能熟視無睹，雖然屢向鄰里勸告，不但不肯接受，反說國父少年狂妄。後來因爲破除迷信，引起村民不滿，乃離鄉赴香港。

關於因破除迷信被迫離鄉一事，關係後來國父領導國民革命事業的發展甚大。陸皓東是國父幼年時期最好朋友，破除迷信，毀壞神像，原是由他二人所爲，結果由國父家人出花銀十兩，修復神像，並迫使國父離開家鄉，以平公憤，他心裏感到非常不安。故於國父走後，他也前往上海求學去了。

國父到了香港，先在拔萃書室 (Diocesan Home) 研讀英文，於一八八五年二月，轉入香港皇后書院 (Queen's College) 繼續求學。由於區鳳墀的介紹，認識了美國牧師喜加理 (Rehager)，因而與陸皓東同時接受基督洗禮。國父受洗的名子孫日新，蓋取大學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之旨；陸皓東則以陸中桂名之。

一八八五年，國父二十歲，這一年是國父生活轉變最重要的一年，也可以說是關係中國盛衰存亡，決心推翻滿清政府，創建民國的一年。何以言之？在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清廷與法國爲安南問題的爭執，曾對法國宣戰。這時國父在香港聽

到的消息比較迅速可靠，有機會知道戰爭的情況，他曉得戰爭一開始，法國海軍頗佔優勢，不但闖進閩江口，擊沉幾艘中國木造大戰船，而且佔領了臺灣的基隆港；中國海軍雖然不是法國敵手，但是法國勞師遠征，他的海軍無力多佔中國地方，而且也不能持久。至於法國入侵安南的陸軍，曾被我國馮子材的軍隊在諒山一帶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潰不成軍。法國因對華軍事失利，曾改組內閣，並要求英人赫德轉達講和之意。不料顛覆無知的滿清政府，竟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廿七日，命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特納，在天津簽訂中法安南條約十大款，並正式放棄安南。

中法之戰，中國本來打了勝仗，反而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，所以國父非常氣憤，誠如其自傳所云：「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。」此一決心，終於二十七年後武昌一段，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清政府，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——中華民國。

國父既決心推翻滿清政府，創立中華民國，所以他就本着「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」的方向去求發展，因而決定學醫，以為入世之媒，並藉以掩護革命工作。一八八六年秋，國父考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之南華學校，第二年春天，轉入香港西醫書院（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）肄業。

國父才智超人，博學強記，醫學之外，兼修經史，尤其喜讀三代兩漢之文章，因此受全校師生之敬佩。國父在廣州博濟醫院時，即開始結交志士，在香港交遊更廣，先後結識鄭士良、尤少紈（列）陳少白、楊鶴齡等人。他們志同道合，意見一致，每於課暇，或往來港澳之間，放言無忌，攻擊清廷腐敗，鼓吹革命道理，因有「四大寇」之稱。

國父在香港西醫書院修業五年有半，於一八九二年二月七日畢業後，即開始行醫。

香港西醫書院與普通獨立學院之性質相同，英人孟生博士及康德黎博士，曾先後擔任該院教務長，李鴻章即當時贊助人之一。康德黎對國父特別器重，師生情誼甚篤，後來國父在倫敦蒙得能脫險，全靠康、孟二氏之營救。國父在西醫書院求學時，除日間研究醫術，夜間攻讀中國經史之外，對於法國革命史，達爾文進化論等書，尤所喜讀。國父對於農學農政也很注意，故其農業知識非常豐富，曾於課餘之暇，撰寫農學論文以「孫翠溪」之筆名，刊登於教會公報及上海萬國公報。

國父在西醫書院畢業成績，特別優異，曾獲各科滿分名列榜首之最高榮譽，由此即知其求學之認真與努力。

國父於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三日，領到中文畢業執照一紙，全文如下：「香港西醫書院掌院，並講師各員等，為給執照事：照得孫逸仙在本院肄業五年，醫學各門，屢經考驗，於內外婦嬰諸科，俱皆通曉，確堪行世。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書院考准權宜行醫字樣。為此發給執照，仰該學生收執，以昭信守。」

香港西醫書院是國父學業最有成就的學府，也是國民革命的發祥地。關於前段所謂「四大寇」一節，根據國父自傳稱：「數年之間（係指在西醫書院期間）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，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詞，無所忌諱。時聞

(128)

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、尤少紉、楊鶴齡三人，而上海歸客，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遊，聞吾言者，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、尤、楊三人，常住香港，昕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。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，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，皆呼余等爲四大寇。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」

國父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時，由於施藥義診，醫術精良，聲名大著。一八九三年三月，廣州中西日報曾刊登武沁之鳴謝啓事一則：「孫逸仙先生，學宗孔孟，業紹岐黃；合盧扁而擅專門，內治與外科並美；統中西而探奧旨，鍼砭並刀割兼長。其平生醫學精純，業經大紳諸公，合詞稱頌，登嶺南諸報矣。余也不敏，質樸無文，偶罹牙齒之災，竟徹辰宵之痛。……諸醫罔效，累月經時。幸遇先生，略施小技，刀圭調和，着手成春。數月病源，一朝頓失。復荷先生濟世爲懷，輕財重義，藥金不受，禮物仍辭，耿耿私心，無以圖報。謹將顛末，爰錄報端，用誌不忘，聊伸微悃；不特見先生醫學之良，抑亦表先生人品之雅云爾。」由此啓事，可見一斑。

滿清統治中國，自稱「奉天承運」，漢人被其愚弄，大都麻木不仁，甘作奴隸，供其驅策而不知覺悟。國父獨倡「天命無常」之論，以之喚醒國人，所以他根據中國史書記載，提出「天命無常」之口號。書經云：「天矜於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」又：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民心無常，惟善之懷。爲善不同，同歸於治；爲惡不同，同歸於亂。」須知天意即民意，所謂：「天聽自我民聽，天視自我民視。」這是說天是輔助有德之人，順從人民之欲望的。滿清末葉，不但國勢危殆，而且作出許多違背民意傷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國父特別強調說：「現在天命已變，大家應順從天意，推翻滿清的統治了。」

國父的革命主張，不僅反對滿清皇帝，而且要摧毀二千餘年以來的專制帝統。他曾發表攻擊清廷的文字如：「暴君肆虐，罪惡滔天。信任奸邪，濫施淫毒，應天順人，除彼獨夫。凡我同胞，毋稍瞻顧。」故滿漢官員，常以狂士視之。

國父行醫期間，因經常忙於應診，無暇策劃革命，經聘請尹文楷醫師協助之後，始能抽出時間，與鄭、陸、陳、尤等秘密集議。國父提出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的宗旨，籌備成立興中會，作爲策進革命機關。自此革命工作由言論鼓吹進入實際行動階段。

國父爲專心致力國民革，決心擺脫醫務工作，乃將藥房事務委託尹文楷負責，獨自返回故里，閉門草擬救國大計。陳少白記其事曰：「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（指國父）在廣州，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：『孫先生失蹤了，藥房開銷很難，收入不敷，只賸下十幾塊錢了。』我接到信，就到廣州去，替他維持店務。等了多天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心裏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來了，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。他見了我就說：『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』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？他說：『這些事不要去管他了。』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，我拿起來一看，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，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，

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隨便修改一下。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，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。我沒有辦法，就讓他去，同時我就替他兩間藥房收拾起來，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。」

國父自傳載稱：「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；門徑既通，端倪大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。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」革命運動，從此展開。上書經過，容於下文述之。

### 三、上書前後國內局勢

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，列強帝國主義勢力相繼入侵，清廷無能，任其宰割，領土主權不斷喪失，賠款負擔日益加重；而列強之經濟侵略，更是日甚一日，直使中國降於次殖民地之地位。當是時也，中國民族外而痛感於帝國主義之爲禍日深，內而憤恨清廷之腐敗無能，加之滿漢種族之不公平，因而抵禦外侮與推翻異族統治之思想，勃然興起。故於鴉片戰爭之後十年間，即爆發了太平天國排滿運動；而於甲午中日之役，引發了國民革命運動。

滿清政府處於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局勢中，政治之腐敗愈演愈惡劣，領土主權之喪失接踵而至，舉國貧困，經濟枯竭，國內局勢，已至無法收拾之境地。寫到這裏，似應把李鴻章效忠清廷之事實、及其拒未接受救國大計之原因，扼要說明，乃能瞭解國民革命之重要關鍵。

李鴻章效忠清廷，任勞任怨，未嘗一日言退；受國大任責無旁貸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較之諸葛亮對西蜀之忠心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誠如清史所云：「獨主國事數十年，內政外交，常以一身當其衝。國家倚爲重輕，名滿全球，中外景仰，近世所未有也。生平以天下爲己任，忍辱負重，庶不愧社稷之臣。」由此可知，李鴻章一人繫滿清之存亡，實爲清室之擎天柱石。

李鴻章少年科第，壯年戎馬，中年封疆，老年洋務，到了晚年更是繫望中外，聲出朝廷之上。他自同治九年（一八七二）繼其業師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起，在任二十餘年，軍國大政，集其一身，歷經乙酉中法之役、中日甲午戰爭，以及義和團所引起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等重大外交事件，均在喪權辱國的條件下簽訂和約；李鴻章對外方針，是發展洋務，模倣西法，所以他極端避免對外戰爭。但當時無知士大夫階級，遇有外事發生，大都主張作戰，因此指責李鴻章爲軟弱外交。有的奏他「十可殺」的大罪，請求明正典刑；有的斥爲漢奸，指爲權臣；總之一般對其「受北洋之害，極使相之尊」，都不免嫉忌而已。

李鴻章一生功過，議論者固然很多，但是在他主持國事辦理洋務那些歲月裏，正是列強帝國主義積極向外發展的時代，李鴻章一面要對付外來的侵略和壓迫，一面還要應付國內虛僞頑固的謾罵與攻擊；到了晚年又得防備維新立憲，其對於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，尤其存有戒心，自然時常陷於艱難困苦之境。

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五日，李鴻章七十賜壽，恩賚極爲隆重，甲午十月，更有三眼花翎之賞賜，華袞增優，榮典非凡，其得賞

戴三眼花翎，實爲有清一代漢人大臣唯一膺此懋績而獲殊榮者，自然得意昂也。

關於滿清末葉國內局勢，就李鴻章馬關簽約被革職以後的一段史實，是最好的說明：

甲午中日之戰，清廷以李鴻章調度失宜，貽誤戎機之罪，將其革職，並把他的黃馬褂及三眼花翎也撤銷了。李之半生威名，至此掃地以盡。據吳永（漁川）「庚子西狩叢談」載稱：「這時李鴻章歸然一老，意頗鬱鬱，然有憤慨而無怨誹，每盱衡時事，撫膺太息，其忠誠悱惻之心，溢於言表。嘗自謂少年科第，壯年戎馬，中年封疆，晚年洋務，一路扶搖，遭遇不爲不幸，自問亦無何隕越。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，致一生事業，掃地無餘。如歐陽公所言：半生名節，被後生輩描摹都盡。環境所迫，無可奈何！又曰：我辦了一輩子的事，練兵也，海軍也，都是紙糊的老虎，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？不過勉強塗飾，虛有其表。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。如一間破屋，由裱糊匠東補西貼，居然成一淨室，雖明知爲紙片糊裱，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。即有小小風雨，打成幾個窟窿，隨時補葺，亦可支吾對付；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未預備何種材料，何種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，但裱糊匠又有何術能負其責！」李以裱糊匠自擬，恰切之至，而以此比喻滿清之空虛，實爲俏妙之論。

李鴻章效忠清廷之赤忱，在其被革職之後，表現的更爲精彩，他一面收拾殘局，充實戰備，一面又去連絡歐美各國駐華使節向日本調停，幸得美使同意出面交涉，日方始允議和。幾經周折，李鴻章奉旨東渡，抵達馬關之後，即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所謂的「春帆樓」之屈辱會議。（馬關條約，係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【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】締結。）

李鴻章以古稀高齡，被迫城下之盟，其內心痛苦，可想而知。數度集會，均無結果，李竟被日人槍擊負傷。日本政府恐因此事引起各國不滿，乃允以無條件停止戰爭。按中日兩國代表在「春帆樓」之會，李鴻章以日方索價過於苛刻，堅不應允，而日本則以遣兵入侵臺灣相威脅。李鴻章責日心狠手辣，欺人太甚。日本野心火烈，意在攫取臺灣，竟對李說出：「臺灣雖是口中之物，尚未下嚥，饑甚！」等語。並對李之隨員加以恫嚇曰：「日本軍隊將分道取北京，並派兵艦卅艘，由小松親王率領攻取大連等地。」此外並以最後通牒方式，警告李鴻章曰：「所議已爲盡頭，惟問中國允不允。」經急電清廷請示，乃互簽稿約。李以顏面無光，返國後稱病不朝。其時中國朝野，均對馬關條約不滿，尤其臺灣同胞，更是惶恐不安，如丘滄海所云：「宰相有權可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！」二語，即可說明臺灣紳民內心之憤慨！

中日簽約，光緒責李鴻章身爲重臣，竟允兩萬萬銀元之賠款，並割讓臺灣，失民心、辱朝廷，喪權辱國，莫此爲甚，責令留京入閣辦事，李固引咎唯唯，但亦自覺慚愧，投閑置散，傲居賢良寺中，其寂寞無聊，可以想見。

光緒二十一年冬，清廷爲答謝俄德等國干涉還遼事件，特派李鴻章爲欽差大臣，經由莫斯科訪問歐美各國，國際聲望，再度揚起。李鴻章所採對外政策，是「以夷制夷」爲原則，連絡歐美牽制東洋，此一策略，雖然正確，終以中國積弱不振，徒招外人「東亞病夫」之譏，收效甚微。

李鴻章訪問各國任務完成後，東山再起，重握政柄，雖有「中興」清室，扭轉乾坤之抱負，卒以帝國主義者之巧取豪奪，及滿清朝野之暮氣沉沉、日暮途遠、心勞計拙、大勢已去，殊無可爲。嗣經多次外交挫敗，加以康梁維新派之指責參奏，終被以大學士空銜，擢出總署之外。

戊戌政變，光緒被禁，慈禧再度聽政；保皇會分子雖遠離京畿，但仍到處活動。同時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，日益壯大，不斷在各地抗清起義，慈禧甚爲恐懼，於光緒二十五年冬，特派李鴻章以兩廣總督名義前往廣州坐鎮。義和團庚子之亂，引起八國聯軍入侵，津沽淪陷，北京危急，慈禧挾光緒逃往西安之後，急電李鴻章再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頭銜，收拾殘局，李於獲知調任消息，曾捋鬚自負曰：「捨我其誰也！」雖然如此，李鴻章對於危局之惓念，仍是悲惻異常。

李鴻章熟悉國情，對於列強之要求瞭如指掌，他早已料到對外交涉的重任，必然由他承擔，他曾以撞鐘的和尙自比曰：「我能活幾年？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鐘不鳴了，和尚亦死了。」言下老淚縱橫，悲愴不已。當他由粵抵滬時尙有人說他徘徊觀望，其實他深知這次外交，都比以往棘手，故暫留上海，窺探列強動靜。當時瓜分豆剖之說，甚爲囂張，英國日本曾擬在兩廣長江之間成立一新政府，用以分裂中土，袁世凱即以此事報告清廷，李鴻章自然加以戒備。

當庚子之亂，李鴻章坐鎮兩粵，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態，拒絕宣戰「聖旨」，這時香港總督卜立（Blake）奉英國當局之命，託何啓陳少白透過劉學詢等以達李鴻章，勸其乘機獨立。劉學詢亦曾函詢正在日本策劃革命行動的中山先生，告以李鴻章因北方拳亂，欲以兩廣獨立，思得足下爲助，請速來粵協同進行等語。

根據日人宮崎寅藏（別號白浪滔天）所著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中所載：「十九世紀之國際問題，當着眼於表裡兩面，揮陰陽之手腕，以與其上下相交，各國皆然，而於支那爲尤甚。蓋各國於支那，在北京則皆滿清之保護者，而於他方則爲民黨秘密會社之機關也。例如甲國結拳匪而起事，則乙國必結政府以定其亂；乙國結政府而謀事，丙國又結秘密會社而敗其成，總之，則利己心而已。港督於拳匪事件，欲起孫李而爲虎嘯一隅之獨立，且加以助力者何哉？蓋以勢力範圍，香港實爲彼之藥籠物，南清之事不足慮，所當先制者法國，而制法國之人，莫如李鴻章之傀儡，李既允，而試革命之運動者秘密會社也。於是不得不需孫逸仙，故孫李握手，直可兵不血刃，一旦而使兩廣獨立，已乃自立於上而駕駛之非其理想耶？而其理想與實際，相距僅一髮間，然竟消沉於一髮間也。」在馮自由之「革命逸史」中，也曾述及此事，他說：「總理得同志報告，知李督尙無決心，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之計，故不入粵。」「古春風樓瑣記」評其事曰：「港督的計劃，好比誘使八十歲老婦，別抱琵琶。單就李的立場來講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。一般說李鴻章觀風色，佯爲默許，正見其老謀深算處。」

余認爲李鴻章對清廷之忠心，有如犬馬之對其主人，其視革命爲造反，視黨人爲叛徒，既拒絕國父上書於前，復令楊儒等監視國父在美行動；並電告駐英大臣龔照瑗於誘禁國父於倫敦清使館時買船解送回國，交由朝廷正法於後，豈能再與國父妥

(132)

協獨立？況李年屆期頤，老氣橫秋，心身具已衰敗，夕陽瘦馬，窮途日暮，當然不會再有野心而圖不軌。尤其他在滿清地位，高在一人之下，豈能自毀晚節，甘受英人擺布呢？所謂孫李携手，絕無可能，港督提倡此議，固屬別有用意而且過度天真，實則癡人說夢，想入非非，不值識者一笑！

庚子年之國際形勢，對於中國非常不利，英日聯合狼狽爲奸，俄法一致圖謀不軌，明爭暗鬭，意在禍害中國；而德國則以聯軍統帥之尊，縱橫捭闔，居心尤爲陰險。俄雖表示歡迎李鴻章主持和議，但其他各國亦有主張拘捕李鴻章作爲人質者，況革命勢力，日趨活躍，而「互保」、「退敵」之議莫衷一是，加之拳民禍首又受到內廷庇護，種種因素均與和議不利，故李鴻章稱病延托踟躕不前。

清廷以李鴻章遲不入京，頗爲焦急，乃頒旨催促曰：「此行不特安危繫之，抑且存亡繫之，旋乾轉坤，匪異人任，勉爲其難，所厚望焉。」李鴻章奉旨晉京，奏請加派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，協商應議事宜，其深謀遠慮，可以見之。幾經交涉，始獲議和，賠款英鎊六千五百萬，合關銀四萬五千萬兩，苛訂周息四厘，每年加息計算總計九千萬餘兩，並規定三十九年還清。以上賠款，分由俄、德、英、法、日、美、意、奧等國，依次收受，此即所謂的庚子賠款辛丑條約是也！

辛丑條約簽訂之後，李鴻章漸感不支，於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嘔血而死。慈禧聞訊，傷感不已，懷念李之忠勤，追贈榮銜，晉爲一等侯爵，諡文忠。滿漢大臣以李功在清朝，發起建立專祠，以彰忠藎，飾終大典，逾格恩加，身後哀榮，可謂盛矣。

李鴻章忠於清室之事實，已如前述。其在清末主持軍國大計數十年，無論內政外交，皆以一身當之，清廷倚重，世界聞名，中外莫不欽仰。其忍辱負重以天下爲己任之作風，可謂「不愧社稷重臣」，曾國藩之外（甚至超過曾氏），絕無僅有；自壯自老，官運亨通，受國大任，死而後已。誠如兩江總督劉坤一疏云：「……臣查大學士李鴻章，經綸遠大，忠愛性成，以翰林起家，受四朝之知遇，出秉節鉞，入贊綸扉，文學武功，外交內治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忠誠爲槩，實爲國家柱石之臣。……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，知天下之有安危，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，以古方今，詎容多讓，時艱孔亟，良臣云徂，緬想老誠，不能不爲朝廷惜而兼爲海內痛也！……」李鴻章逝世之後，滿清局勢愈益不可收拾，其政治之腐敗，更是不堪聞問，卒至國父領導之辛亥革命告成，而清社以屋。寫到此處，應該補述一段革命史話，以說明初期革命運動之艱苦情形，及中國民心之背向。

國父自從甲午年上書李鴻章，被「拒絕接見」之後，即與陸皓東先至北京，窺探清廷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，作爲異日發難之圖。至中日戰起，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香山及美國各地，創立興中會，糾合海外華僑以爲臂助。「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……予則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。慘淡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周，聲勢頗衆。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，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，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。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」（以上錄自國父自傳之二）此即乙未年九月

九日廣州首次起義亦即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國父說：「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，則國內之根據、個人之事業、活動之地位、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，皆完全消滅。而海外之鼓吹，又毫無效果。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、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。當此之時，革命前途，黑暗無似，希望幾絕，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，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。……庚子之役，爲予第二次之失敗也。經此失敗而後，回顧中國之人心，已覺與前有別矣。當初次之失敗也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，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。吾人足跡所到，凡認識者，幾視爲毒蛇猛獸，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，而有識之士，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後相較，差若天淵。吾人睹此情形，中心快慰，不可言狀，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。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，清后帝之出走，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，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，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，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。」（以上見國父自傳之二）從這段革命史話之中，即可看出清末局勢之危急，初期革命之艱苦，以及中國人心之背向矣。

#### 四、上書動機與目的

國父上書李鴻章與國民革命之發展，已見前文。惟上書經過情形，說法多不一致，甚至見解歧異歪曲史實者數見不鮮，亟有加以澄清考訂實在之必要。在未述及上書經過之前，先將上書動機與目的說明於次：

國父上書李鴻章之動機，應先從他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講起。西醫書院創辦人何啓，留英多年，學貫中西，是一位憂時愛國之士，經常發表革新救國的言論和文章，因而影響國父的思想頗爲深刻；其次是受到他的同鄉鄭官應的鼓勵。鄭官應的學問很好，曾遊歷西歐各國，對於外國之政治、教育、經濟以及治亂得失之道，甚爲熟悉。他主張中國應倣效西法，推行新政，並對振興實業，倡導甚力。李鴻章對他頗爲激賞，曾奏請鄭氏專辦商務並任招商局總辦。他在招商局任內，前往南洋一帶考察僑務甚詳，並經常撰寫時論倡言新政，頗爲世人所重。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在上海出版之「盛世危言」，即爲鄭氏所撰寫。在其自序中有云：「自知憤慨之詞，不免狂瀾僭越之罪；且管窺蠡測，亦難免舉短略長，蹈舍己芸人之譏。惟聖明在上，廣開言路，登賢進良，直言無隱。竊願比諸敢諫之木，進善之旌，俾人人洞達外情，事事講求利病。如蒙當世巨公，曲諒杞人憂天之愚，正其偏弊，因時而善用之，行規積習漸去，風化大行，華夏有磐石之安，國祚衍無疆之慶；安見空言者不可見諸行事，而牛溲馬勃，毋亦醫國者所蓄爲良藥也歟？」在「盛世危言」五十五篇論文中，「農功」一章，即係採自國父以「孫翠溪」筆名所發表之「農政」論文，故他們二人之間早已奠立文字之交了。鄭氏曾有「吾鄉孫翠溪西醫，頗留心植物之理。」等語。「盛世危言」裡提倡「

(134)

人盡其才，地盡其用，物暢其流」的道理，在國父上李鴻章書中，更具體的說出：「夫人能盡其才，則百事興，地能盡其利，則民食足，物能盡其用，則財力豐，貨能暢其流，則財源裕。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，治國之大本也。」可見鄭氏的見解和國父的主張，不但相同，而且也是互相影響的。

另外一個觸發上書動機的因素，是由於當時一般愛國憂時之士，上書請願的風氣已開，他想到李鴻章既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，而大權在握，無異是滿清的第二朝廷，如果李能採納上書意見，接受他的主張，未嘗不是一條可行的救國途徑；假若李鴻章拒絕不納的話，那麼借此作個試探，也是革命的策略之一，而且對於以後革命大計和方針的策劃與決定，也好早作準備。基於上述動機，乃決定上書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。

關於上書的目的，上文已概略提到，茲再引證下列各書之記載，以徵其實。

鄒魯著：「中國國民黨史略」云：「總理為觀察清廷虛實和北方的形勢，便和陸皓東離粵北上，遊歷北京、天津。……總理為試探李氏的政治態度，便給他上了一個救國意見書。」

張其昀著：「黨史概要」云：「總理原欲試探李氏的意見，俾作實行革命的張本，並非欲與滿清政府妥協。」

李正中著：「中國革命史教程」云：「欲晤李鴻章試探李氏意見，以為革命張本。」

李守孔著：「國民革命史」云：「國父生平之一貫宗旨，在於『和平奮鬥救中國』。非不得已，不從事流血戰爭。及見國事之不可為，乃遊京師，以窺清廷虛實，旋至武漢，觀察山川形勢，預為他日革命發難之圖。」

傅啓學著：「國父孫中山先生傳」云：「他在香港、澳門、廣州聯絡同志，進行革命工作，目的在創立良好的政治，他知道滿清政府根深蒂固，想將之推翻，必須有重大的犧牲。所以在進行革命之前，擬以和平手段，漸進方法，請願於清廷，使能推行新政。……李鴻章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，又是當時洋務運動的領袖，若是得到李的贊助，……未始不是改革中國的捷徑，所以他決定先上書李鴻章。」

此外在「政治評論」第二十五卷第十一期，載有龐景龍寫的一篇「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」，在這篇文章裡，有的地方余實不敢苟同，但他認為「國父深知清廷的頑固保守，李鴻章的衰老而無進取的意圖，故特上書，條陳政治主張救國大計，並自述生平志願，似若希求李鴻章的拔用，玉成其志；並將上書全文，連續刊登在上海基督教會廣學會所創辦的萬國公報上，以廣流傳。及至李鴻章未能採行他的主張，未能引用他的鴻材，這就證明清廷沒有推行新政的誠意。國父向李鴻章上書的成就，即在揭穿清廷推行新政，實行立憲的騙局。使人確信朝廷既不能推行新政，則除了實行革命，廢除滿清，就沒有其他的救國捷徑可尋了。」這段講法，似乎還有點道理。

據「革命先烈先進傳」——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——所載：一八九五年（光緒廿一年），廣州首

義失敗，陸皓東被捕之際，清吏嚴刑拷問，迫其供出同黨，陸皓東昂然不屈，寧死不供，臨刑之前，索取紙筆，慷慨書云：「吾姓陸名中桂，號皓東，香山翠亨鄉人，年二十九歲，向居外處，今始返粵，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，官吏之貪污庸懦，外人之陰謀窺伺。憑弔中原，荊榛滿目，每一念及，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居滬多年，碌碌無所就。乃由滬返粵，恰遇孫君，客寓過訪，遠別故人，風雨連床，暢談竟夕。吾方以外患之日迫，欲治其標；孫則主滿仇之必報，思治其本。連日辯駁，宗旨遂定，此爲孫吾與吾倡行排滿之始。蓋務求警醒黃魂，光復漢族。無奈貪官污吏，劣紳腐儒，靦顏鮮恥，甘心事仇，不曰本朝深仁厚澤，即曰吾輩踐土食毛。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，入主中國，奪我土地，殺我祖宗，擄我子女玉帛，試思誰食誰之毛？誰踐誰之土？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與夫兩王入粵，殘殺我漢人之歷史，猶多聞而知之，而謂此爲恩澤乎？要之，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以光復漢族，非誅除漢奸，又不足以廢滅滿清。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，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。今事雖不成，此心甚慰。但我我可殺，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。公羊既歿，九世含冤，異人歸楚，吾說自驗，吾言盡矣，請速行刑！」這是何等壯烈的措辭！從這篇激昂慷慨，不屈不撓的最後遺書（供詞）中，亦可看出陸皓東同國父北上的用意和目的之所在了。

## 五、上書經過情形

關於上書經過情形，不但說法未臻一致，見解歧異不同，而且多以在國父所有著述及言論中從未提及「救國大計」及上書一事，因而發生疑問；殊不知在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國父所撰之「倫敦蒙難記」中即已述及上書之概略矣。他說：「吾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，不合於時勢之所需，故欲以和平手段，漸進方法，請願於朝廷，俾倡行新政。」又說：「與中會之所以偏重請願上書等方法，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，政府之或可奮起。且近年以來，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，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，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，合會全體聯名上書。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迫北京，在吾黨欲利用此時機，而在朝廷甚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人心，遂暫擱不報。但中日戰爭既息，和議告成，而朝廷即悍然下詔，不但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，且云此等陳情變法條陳，以後不得擅上云云。吾黨於是慘然長歎，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，然望治之心愈堅，要求之念愈切，積漸而和平之手段，不得不稍易以強迫。」假定明瞭這段記述，對於上書一事，尙有何疑？間有近人所作有關史料，對於上書年月及遞達方法，記載亦有出入。人言言殊，莫衷一是，亟有詳爲考據，編訂確切可靠之史書，以正視聽，而徵信實之必要。茲將上書年月及遞達方法之異同文史，摘要列后：

國父上李鴻章之「書」中有云：「顧文之生，二十有八年矣。」因之有人據此以爲上書之時間是一八九三年（民前十九年歲在癸巳），例如陸友白所編「孫文全集外傳二」裡邊載稱：「一八九三年歲癸巳，與陸皓東北遊津沽，西入武漢，窺清廷之虛實，探長江之險要，復上書於李鴻章。……不納，復謁之於私邸，勸其中興，李以年老見却。」其他如甘乃光之「國父年譜」、師

鄭之「國民革命要覽」、李根源之「中山傳略」、以及貝華之「中國革命史」等書，都是認定 國父同陸皓東北上的時間是在民前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歲在癸巳。他們的說法，都犯了「只知二五，不知一十」的毛病，因而在上書的年月上，發生了錯誤。蓋國父自己對於他的年齡，都是按照陽曆實歲計算，他所說的「顧文之生，二十有八矣。」照中國所謂「虛歲」計算，就是二十九歲。比方 國父自傳裡說西醫書院畢業那年是二十六歲，但其畢業文憑上載明時在一八九二年七月，即民前二十年，光緒十八年歲在壬辰，而在「國父年譜」的記載，也是二十七歲。再就民國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外同志電文裡，也載有：「文行年五十有二，奔走革命垂三十年。」等語。民國七年， 國父五十三歲。五十二歲，當係指其實足年齡而言者，當無疑問。基於上述，國父上書李鴻章是在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，光緒甲午年，亦即西元一八九四年，乃為定論，而以上書年代在民前十九年，西元一八九三年，光緒癸巳年的說法或記述，都是錯誤的。

關於 國父上李鴻章之「書」，是如何遞達的方法，說法亦多有不同。有的說是親自帶去見李的，也有說自海外郵寄去的。親自帶去見李的說法，不但正確而有根據，而且合乎情理。例如鄒魯的「黨史稿」，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要，馮自由的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，以及傳啓學的「國父孫中山先生傳」，李守孔的「國民革命史」，賀勛的「國民革命史演義」，等等，大都見解一致，論點相同。說是自海外寄去的，似與事實不甚符合，難於採信。例如牛粟所編之「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」，林百克所編「孫逸仙傳記」，胡去非所編「孫中山先生傳」等書，不知有何根據。至於究由何人介紹見李一節，其說法也並不盡相同，姑不論列。

國父上書李鴻章經過之可靠資料及書刊，多不勝舉，僅就其中較為主要者，簡述如下：

黨史編纂委員會所編印之「國父年譜」記載：「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（一八九四年），先生二十九歲。五月（六）偕陸皓東至天津，上書李鴻章，陳救國大計，鴻章不能納。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鄭官應，由其函託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。迨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，先訪羅，又得徐秋畦為先容，請介見鴻章，先生以書進。……然其時中日間戰雲密布，無意改革之圖，迄未接談。」

「中國國民黨簡史初稿」（黨史會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本）記載：「紀元前十八年（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）中日構兵，為窺清廷虛實計，遂偕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便道寓書李鴻章條陳意見，以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」為救國要務。旋即溯江而至湖北武漢，隨處觀察山川形勢，及民間情況。既返粵，即出國而至檀香山。」

「中國國民黨史稿」（鄒魯編著）記載：「適甲午中日戰間，總理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聞清北洋大臣李鴻章有興復中國之意，乃由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員徐秋畦介紹，上書於李，李不能納，惟予以農學會籌款護照。然無革命之信念，……且年已垂暮，無意事業，總理知不能使之有大作為，值清兵疊敗於日，內外威信掃地，總理以時機可乘，乃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。」

「黨史概要」（張其昀編著）記載：「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中日戰爭爆發，總理憂念國事，對北洋大臣李鴻章，號稱中國的卑斯麥，負軍政重任，且爲西醫書院名譽贊助人，總理欲上書商陳救國大計，……遂有平津之行。至上海晤陸皓東，相偕北上，並由總理同縣的鄭官應作函介紹於李氏幕僚羅豐祿。抵津後乃以所擁萬言書上之李鴻章。……李托辭無暇接見，謂宜待之異日。」

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（馮自由著）記載：說國父是由「王韜介紹於李鴻章的幕府羅豐祿，由羅介紹見李，而李拒絕接見。」此外在傳啓學之「國父孫中山先生傳」，李守孔之「國民革命史」以及賀勛所撰之「國民革命史演義」等書中，對於上書經過情形，都記載的很詳細。

另外還有兩種極爲珍貴而且非常權威的可靠資料，一爲陳少白之「興中會革命史要」；一爲吳敬恒之「中山先生年系」。前者對上書經過記述甚詳，其最重要的一段說：「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，王韜就寫了封信，介紹孫先生到天津，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，同老夫子商量商量，或者可以見李鴻章。孫先生快樂極了，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。那時候，剛剛中日大戰，打得厲害。李鴻章蘆台督師，軍書旁午，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，李鴻章是否看過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過後來李鴻章說：『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。』孫先生聽了這句話，知道沒有辦法，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。」後者對於國父北上京津，是否會到李鴻章沒有，批判精確，實爲不易之論。

一般撰寫上書李鴻章經過，認爲國父曾與李鴻章晤面者，多有引用前上海時事新報館所編「中國革命記」，及吳敬恒所寫編年系「別傳」二書。「中國革命記」所云：「至北京時，冒險謁李鴻章，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，革命之不可緩，議論雄快。李謝之曰：今日之革命，余亦知其不可已；然余精力既衰，斷不能大有爲，幸君努力爲之，中國前途，惟君等是賴，余必爲後援云云。」這段記載，既不合乎情理，又無任何根據，其與謝君韜之「總理革命史話」中「進見李鴻章暢論建國圖強之道，自上午八時直談至下午四時。」一段謊言，同屬無稽。關於吳敬恒所編「中山先生年系」之「別傳」中寫的「中日交戰前，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，由海路入北京，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，陳說大計，勸李革命，李以老辭」。須知「別傳」既非吳著，而「別傳」之言語，當然亦非出自吳口。

吳敬恒編「中山先生年系」，寫至國父二十八歲時，先引「國父自傳」。（國父自傳有二，民前十五年，在英國倫敦寫過一件；民國八年在上海又寫了一件。後寫的，全文收入「孫文學說」中以有志竟成爲題，列爲第八章。）因爲自傳裡沒有提及上書李鴻章的事，所以又引「別傳」，並指出「別傳」之錯誤。他說：「若甲午曾深夜晤李於私邸，必不作此開端。則『別傳』冒險之說，必係傳聞之誤。」基於此一論據，即知吳敬恒所編「中山先生年系」中對於「別傳」之謬誤，既引而闢之，並認定國父與李鴻章，沒有會面的可能。基於以上論據，國父始終未與李鴻章晤面，乃爲定論。

## 六、結 論

國父上書李鴻章之「書」，又名「富强論」或「救國大計」，亦有稱之爲「萬言書」者。這篇文章是國父全部遺教中最早的一篇，也是國民革命開始行動時期極爲珍貴重要的文獻之一。這篇文章撰寫的時間，根據中國國民黨之黨史資料，是在民國紀元前十八年、光緒二十年（甲午），即公元一八九四。在「國父年譜」中記載：「是年正月（公元二月），國父草富强論。旋自粵赴滬。五月（公元六月），偕陸皓東至天津，上書李鴻章，陳救國大計，鴻章不能納。六月二十三日（公元七月二十五日），中日戰爭爆發。九月（公元十月），萬國公報刊載國父上李鴻章書。按：「本書於上李鴻章後，約三四月刊載於上海萬國公報上。萬國公報是上海基督教廣學會所辦的刊物，於一八八九年創刊。是一種週刊，每逢星期六日出版。本『書』連續登載於一八九四年九、十兩月份。」

關於「救國大計」全文被發現的經過，是在吳敬恒（稚暉）民國十四年四月，寫給鄒麗萍的一封信裡講出來的。吳的信中云：「中山先生的遺著，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，自然大家都看過，都知道。惟有他早年的言論，只有他的自傳裡講了一點，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。並沒有長篇大作，確然是當時寫出來的，供我們一讀。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，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，才在甲午年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，錄了一篇上李鴻章的信，介紹到十九期的『語絲』，這真是一個古董。在當時或者也同『盛世危言』、『庸菴文編』等一例看過，現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，顧先生已在『語絲』裡下了許多的定評。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：『這篇文章裡說的話，自然有些時間性的話在內，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，還是一貫的。那篇裡所說的話，不過具體而微，是思想的胚胎罷了。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，『盛世危言』裡也採用了他的兩篇稿子。戴先生自恨粗疏，竟把題目忘了。』以上所引的一段史實，確爲有力而且可靠的根據。

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出版的「革命思想」第九卷第六期所載周開慶寫的「國父上李鴻章書的經過及其價值」一文裡，曾引用于右任的話說：「有人懷疑這篇文章不是國父作的，這種思想，更爲荒謬。試與國父其他文章相比看，語氣做法，完全一致。而立論的博大，目光的高遠，文章的波瀾，在當時實無其嚆。當時作者，不患無此才藻，獨患無此心胸。即歷史上許多所謂治安策、萬言書，也都不可相提並論。如所云：『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。』這是何等的氣象！近代各國的政治學者各種努力，也還出不了這幾句話的範圍。」

于右任認爲國父上李鴻章的書信，「不僅在思想上揭示了正大的目標，在文字上已開啓了本黨文章的作風；暢達懇切，並有着人類至上的熱情，奔放其間。」此外在「中央半月刊三七〇期（五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），陸雲章所撰「總理上李鴻章書之考訂」一文，也有詳細的記載。

張其昀認為：「上李鴻章書，包含着 國父生平兩個最基本的觀念。他論到中國改革之道，謂『固患於能行之人少，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。』這便是知難行易學說的濫觴。知難行易的旨趣，仍在於『躬行實踐』。這封信裡曾一再提到『躬行實踐』四字。他又說：『今日之急務，首在陶冶人才。先養而後教，尤為今日之急務。』先養而後教，就是『建國之首要在民生』的意思。由此確定了民生主義為三民主義的重心。民生第一、實踐為貴，是 國父的學說根本思想，也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最大原動力。」

國父上書李鴻章，不但提供了救亡圖存的大計和綱領，而且也指出了洋務運動的缺點與弊端，其治國大道之徹底，文章氣概的宏放，固當時之人所不敢亦不能道，即以今日而論，仍具有極高的價值與嶄新的意義。而研究 國父遺教——尤其任教 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課程之人，更應特別加以體認。自五十九年十二月六日，臺灣電視公司播映「開國前後」電視小說（開國前後歷史劇是否應以「電視小說」之型態播映，也是值得檢討的問題，容於另文論之。）有關 國父北上天津謁見李鴻章，西裝革履（按： 國父與陳少白於民前十七年，一八九五年，即光緒二十一年，因在橫濱無法活動，乃斷髮改裝。 國父遠遊美洲，少白仍留日本。）完全洋人模樣，將所携萬言書親自呈遞，並與李鴻章晤談甚久一幕，因內容荒謬，不符史實，引起許多觀眾不滿，紛紛為文駁斥。自同年同月之十二日起，光是在中央日報副刊上，就連續刊載有關論文計有八篇之多，其中以多陽所撰「關於 國父與李鴻章讀後」一文，最為精闢。（其他報章雜誌所載有關論文尚未計入。）

總之，吾人為維護國民革命歷史，為宏揚 國父思想，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說，都應力求正確，不可稍有歪曲或偏見。本文之作，意在引玉，黨史權威，革命先進，其然乎哉？

### 參考資料

- 國父全集——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。
- 國父全集——國防研究院、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。
- 國父年譜——羅家倫主編。
- 國父家世源流考——羅香林著。
- 孫逸仙傳——林百克著、徐植仁譯。
- 總理事略——胡去非著。
-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——傅啓學著。
- 不朽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——井琴子著。
- 國父孫先生新傳——王昭然編著。

- 國父孫先生本紀——黃光學著。  
國父孫先生傳——蔣星海著。  
總理年譜長編初稿——黨史會編印。  
孫中山先生傳——鄧慕韓著。  
孫先生少年時代逸事——簡又文著。  
孫逸仙與新中國——康德黎著、鄭啓中等合譯。  
中山先生年系——吳敬恒著。  
國父年系及行誼——吳敬恒著。  
國父青年時代——吳壽頤著。  
國父傳——鍾雷等執筆合編。  
國父思想與人格——梁寒操著。  
國父思想之研究——羅剛著。  
國父傳略與時代思潮——唐子宗著。  
國父思想輯要——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出版。  
國父思想通論——晁介嶺等合著。  
國父思想概論——張鐵君著。  
國父思想教程——黃鎮荃編著。  
國父思想——邱有珍著。  
國父思想——王昇著。  
國父思想基本教材——吳寄萍編著。  
國父思想論——蔣一安著。  
國父思想——楊希雲著。  
國父領袖黃埔中國——晁介嶺著。  
國父自然偉大之風範——晁介嶺著。  
中國之命運——蔣總統著。

國民革命緣起——許師慎著。

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——開國五十年紀念籌備委員會。

吳稚暉先生選集及張文伯著吳敬恒先生傳。

興中會革命史要——陳少白著。

開國革命史、革命逸史初集——馮自由著。

國民革命史——李守孔著。

革命先烈先進傳——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。

中國國民黨史略——鄒魯著。

黨史概要——張其昀著。

總理革命史話——謝君韜著。

中山出世後六十年大事記——牛粟編著。

中國國民黨簡史初稿——中央訓練團印。

中國國民黨概史——國防部總政治部印。

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文獻——陸曼炎編著。

中國革命紀事本末——陸孝威著。

中國外交史——傅啓學著。

中華民國外交史——張忠絨著。

總理倫敦蒙難史料——王寵惠著。

李鴻章晚年之際遇——芝翁著。

清德宗實錄——清史。

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——丁文江著。

三民主義研究論文集——張其昀著。

三民主義通論——葉守乾著。

三民主義綜合論——晁介嶺著。

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總輯——徐文珊纂輯。

三民主義新解——任卓宣著。

三民主義總論——金平歐著。

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——各界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籌委會。

蹇蹇錄——國防研究院印。

三十三年落花夢——宮崎寅藏（白浪滔天）著。

八十述略——孫科著。

國父的名號化名及尊稱研究——晁介嶺撰文。

國民革命史演義——賀勛著。

國父上李鴻章書的經過及其價值——周開慶撰文。

總理上書李鴻章之考訂——陸雲章撰文。

談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——龐景龍撰文。

國父與李鴻章——嚴方文撰文載於中副。

也談電視小說的國父與李鴻章——菽撰文載於中副。

國父晤李鴻章的史料——卓英羣撰文載於中副。

評清宮殘夢——李炎文見中副方塊。

國父到底見到李鴻章沒有——中央日報資料見中副。

關於 國父與李鴻章——丁衣撰文載於中副。

關於 國父與李鴻章讀後——冬陽撰文載於中副。

開國前後——童怡撰文載於中副。

中國革命史教程——李正中編著。

中國近代史——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。